

第一章

“生当为人杰， 死亦为鬼雄”

一、民族正气贯长虹

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是民族感强烈的民族。历代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西汉时的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威胁利诱不能屈其节、牧羊苦寒不能丧其志、经历了 19 个春秋才见到了故乡明月。宋朝的文天祥更为可歌可泣。他辗转逃亡、九死一生的经历，他那气势磅礴的《正气歌》，以及昂首刑场的高大身影，永远铭刻在世人的心中。明代的戚继光，成功地抗击倭寇从海上入侵，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保卫了一方平安。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入侵，生灵涂炭，割地赔款，灾难深重。日本侵略者独霸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30 年代更是变本加厉：1931 年侵吞了东北，1937 年又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燃烧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烈火。如果说史载的民族精神有时还带有某种狭隘性的话，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风暴无可怀疑地具有大中华的性质。

(一)

我们的祖先，“他们为保卫土地 / 从不曾屈辱过一次。
(艾青《北方》)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继承祖先“不曾屈辱过”的精神？各种文学作品满怀激情地表现了祖先的这种精神演化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救亡的感情像沸水， / 使大家全部变成了疯狂， / 这声音，比敌人的炸弹更响， / 这声音，像爆裂的火山一样” (臧克家《伟大的交响》)。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人们都在积极参与，时髦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如果嗅到一丁点儿被认为含有“异味”的言论，比如梁实秋的“文学可以与抗战无关”论，就要进行严厉谴责。抗战就是一切，可战局屡传不利。如果做了“遗民”，除了“泪尽”，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作家们热情歌颂了具有“像沸水”一样“救亡的感情”的民族武装。他们知道，没有这样的武装就没有民族战争的胜利。戚继光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戚家军才成功地粉碎了倭寇从海上侵犯的阴谋。郑成功能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靠的也是他那不辞劳苦渡海作战的数万民族志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是抗战的中坚力量。他们有“沸水”样的民族感情，并且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平型关歼敌精锐板垣师团就是其一。沙汀、周立波、田间、马加、魏巍、邓拓、雷加、鲁黎、周游、西圣等对其做了真实的反映。爱国热情也表现在一些转向的军队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树立起来之前，辛亥革命以来，中华大地没有消失过战争的烽烟。长达一二十年的新旧军阀混战还没有结束，又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对工农红军的“围剿”。日寇疯狂进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各政治势力几经曲折，在抗日救亡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枪口一致对外，还打了一些硬仗，比如“八一三”上海抗战、台儿庄歼敌。郭沫若、林林、

田汉、宋寒衣、郭我力、辛芳、艾芜、胡怀琛、赵景深等都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除了正规军之外，还出现了不少群众性的地方抗日武装。他们不愿当亡国奴，将祖先不屈辱的精神化为了自己的实际行动。曹白《访江南义勇军第×路》写了长江南岸与太湖东岸一带民众不屈的民族情感和救亡斗争——民众组建的游击队“非常的多，宛如晴夜的星星”。同以这一地区为背景的是谷斯范的长篇《新水浒》。这部小说以太湖为背景，写那里的民众武装的不屈战斗和由不纯到纯、由游吃队变成真正游击队的故事，为太湖抗日武装唱了一首令人难忘的民族赞歌。从客观上来讲，不拿起武器也没有出路。“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作家们也热情歌颂了普通民众“像爆裂的火山一样”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了民众从军观念的变化。过去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现在是好男要当兵，还要争取当好兵。杜甫《兵车行》神鬼皆悲，抗战“兵车行”振奋人心。“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古今依旧，可“爷娘妻子走相送”时出现的“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凄惨情景却不见了踪影，而“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后果也不复存在。代之以什么呢？田汉《征夫别》作了回答：“（男唱）马萧萧，车辚辚，/辞了情人去出征，/（女唱）车辚辚，马萧萧，/送我们的战士去把国家保……（女唱）送情郎，上战场，/抗强敌，/救危亡，/祝凯旋，/还故乡，还故乡！/（男唱）别情人，上战场，/抗强敌，/救危亡，/不凯旋，/不还乡，不还乡！”由悲戚变成了豪壮。还不仅如此，王昌龄《闺怨》写“不知愁”的“闺中少妇”春发感慨：“悔叫夫婿觅封侯。”抗战时的少妇不仅不悔，自己还要去呢！老舍在《兄妹从军》中写道：“王家少妇不知愁，夫婿出征雪国羞。更有银娥奇女子，雄心壮志美名留。”由消极的“悔叫夫

媚”到自己积极的参与，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主动从军的热情之高，前所未有。曹白《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就做了如此反映。这篇散文写难民所的青年难民要求所方设法让他们到前线去，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光是吃吃睡睡，无聊，我们愿意上火线，扛子弹，掘壕沟……”使人们深深感到“四百多条生命的强烈的呼吸”。陈瘦竹《庭训》选的是从前仆后继的角度对从军的支持。大儿子大林为国捐躯了，张老爹悲痛欲绝，但他深明大义，又动员小儿子走杀了六个鬼子的哥哥的路。小林也深明事理，穿上了军装，接过了哥哥的枪。鲁彦的《重逢》有些不同。父亲没有张老爹那样的思想，儿子却能像张老爹那样以民族大义为重。他不顾父亲要登报脱离父子关系的威胁，毅然从军去到前线。万迪鹤《复仇的心》也写了志愿参军杀敌的故事。从军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军队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前线的军队不是为某个别力量卖命，是为民族而战，为中华民族的新生而战。大力支援前线，这是人们的共识。相当多的作家都写过民对军的支持。方敬的《光》写“严寒的冬夜”妇女们不辞辛劳作奉献，白朗的《老夫妻》写为战争献出了全部储蓄，彭慧的《巧凤家妈》写为修边境公路以利抗战献出了自己。

作家们还热情讴歌了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新型的军民关系。军阀时代，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兵如匪、匪如兵，扰民害民，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民众对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字：恨！全面抗战爆发，相互对准的枪口调转了方向，对准了太阳旗。他们的变化得到了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过去的恶迹也被善良而顾全大局的民众宽容了，进而还得到民众的拥护。陈白尘《慰劳》写的就是历来怕兵的千金小姐以热情和赤诚之心慰劳受伤战士之事。王西彦《仇恨的生长》描写的军民关系更为感人。一些抗日兵士败退了下来，疲倦得在张二驼子家干马粪里睡着了。张二驼子返家见了十分内疚，即请进屋，盛情款待。兵士们要去赶大队伍，鬼子兵也将撵来，张二驼子携全家紧跟

中国军队撤走，终因无法跟上再加情况紧急而失散了。三天后，被日本兵弄得家破人亡的张二驼子只身一人找到了部队，不幸的是又被守卫士兵误认为是汉奸打伤了。虽奄奄一息，他仍说“俺不恨老总！……恨那黑心的鬼子！”还祈求地伸出手：“给俺一杆枪……”鲁彦的《伤兵旅馆》从另外的角度，也就是从张二娘对伤兵由反感、愤恨到和谐以至最后视为亲人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建立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军民鱼水情的过程。

（二）

曲折表现爱国情是作家的又一种艺术追求。这在沦陷区、“孤岛”尤为突出。前者为日占区，爱国有罪；后者政治环境复杂，限制诸多。即使如此，也没有消失表现民族精神的意愿，只不过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

“奴隶生涯抱恨多，横暴蛮威奈若何？”这是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中的主人公太明的诗句，真切地反映了沦陷区民众的生活。怎么能不“抱恨”呢？随太阳旗来的是比从前更加深重的苦难。但娣的《安荻和马华》以“九一八”后东北广袤的土地上原本就窘迫的日子也就更艰难为背景，描写了安荻和马华纯洁的爱情与艰辛的生活，特别是马华为了全家的生存到xx，在“离城二十里的山谷，建筑一座监狱”。几个月过去了，不仅没拿到钱，还时常受非人的折磨。实在不能忍受，他选择了逃跑。终因伤和病他没有能回到安荻身边，他死在了归家的途中。朱媿《小银子和她的家族》与《安荻和马华》有相同的背景，不同的是具体故事。这篇曾被“敌伪审查机关撤销”的小说主要写的是龙会长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及阴谋暗箭让小银子被迫被他玩弄、最后小银子结束人生的悲剧。类似的，还有刘莉、梅娘、吴瑛、蓝苓、左蒂等的作品。主人公被黑暗吞噬了，可他们不屈的抗争却像划破夜空的亮光留在了人们记忆的深处。反映沦陷区的作品也没有止于“抱恨”。虽说

对日本人“横暴蛮威”无可奈何，也不是甘作鱼肉，不管奈不奈得何，也要“奈”一下。“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

（《亚细亚的孤儿》太明诗）荆轲无畏鼓舞、民族精神永存，怎能让在明朝就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倭寇称凶？但处于最黑暗时期的沦陷区作家一般都不可能写得如台湾光复前夕才完稿的《亚细亚的孤儿》那么直接和袒露，采取的是有限度、有节制的表现方式。吴岩的《离去》写的就是无法压抑的潜藏在心底的爱国情的隐现。王慧珠在沦陷了的老家从事教书的工作。她潜在的爱国思想时时被学生们诱发，而她的民族情结也时时影响着学生。有的学生故意隐去 918 三字，问她 802 加 116 是多少，还有学生在她教折的飞机上画了国旗。问答的默契与视而不见使师生心心相印，双方都得到鼓舞和心灵上的满足。后有人要来参观，校方要她清查学生有没有能引起当局不满的地方，她终因“未尽责”和鼓励学生“违规”以及不愿改掉“不妥”的地方而被辞退了。虽丢了工作，但她不悔。左蒂以沦陷后的东北写了一些短篇，有的表现还比较“露”。《异乡人》写的是一个在台儿庄战役打断了腿流落东北的老兵。虽说因伤残而处于困窘，他并没有气馁：仍关心国事、“倘不胜利”决不回家、还想到别的地方去做事。《不屈的人们》写倭民视日方限制于不顾，“组织了一个读书会”，结果招致被捕“矫正”。在正义朋友的帮助之下，他成功地“逃狱”了。可他的朋友因“救了一个问题严重的犯人”，在火车站被捕了。他们的确称得上是蓝苓在《夜航》开篇诗所称的“紧握着生命桨”的“艰辛的夜航者”。关露《夜莺》选的是另外的角度。这首颇有感染力的诗从夜莺“飞过我的窗户”联想开去：这只从“失去了的故国园里”飞来、“也在歌唱”的夜莺，“你那响亮的音节跟/有着血的闪光的翅膀，/让我知道，你不是在悲哀，/也不是在逃亡，你是在把消息报告我，/并且要让我知道你是在/战斗中飞着。”对“艰辛的夜航者”寄以深情。

不合作主义是作家描写的又一种选择。所谓不合作就是不替日本人办事。一般来讲，比起民族英雄主义来，这种方式无疑是要软一点；但如果我们联系其产生的特殊原因来进行分析，也会让人产生刮目相看的感觉。这种现象在“孤岛”有较为突出的表现。这是由其特殊地位决定的。“孤岛”由外国“租借”者占据，既不同于沦陷区，也不同于国统区，更不同于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同胞们的爱国热情，“老外们”有时睁只眼闭只眼，有时又大钳其口，甚而至于不惜武力镇压。原因何在？他们在看日本人的眼色，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与日本人合作就是从这样的石头缝隙里生长出来的挺拔的绿树。1939年3月上海出版的《上海的一日》报告文学集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雅庸的《不合作主义》写一女工被骗之事：她本是去英国人开的怡和纱厂，结果被拉到日本人开的纱厂。知真相后她即想法逃出来，“我死也不替他们做工的”

钟望阳的《钱念华》写的是知识分子。抗战爆发后，虽有许多日本朋友，也“宁愿息隐在家，不肯跟日友往来”的钱念华经济困难，见报上登了职业补习学校缺日文教员广告，应聘而至。可当他知道学生学日文的目的是为了去同日本人做生意，就辞职了。他感到非常痛苦，因为“现在教日文，只不过多造出一些专门去跟日本人做生意的人来，没有什么意思”。他又回到困窘之中，但他愿意。虽是“钱念华式的爱国”，也使人产生敬意。也有非“钱念华式”的处理方法：不辞职，也不做对不起祖宗的事，身在曹营心在汉。“告诉你——/我们卑污地卖掉自己的精力，/但在痛苦的心情下，/留着祖先遗传下来的人格。/大地的黑夜该有个尽头，/我们这一群被驱赶的羔羊，/有一天，/站起来——/从被损害过的地壳上。”（沈圣时《我们的心语》）日本人也知道，要征服中国人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认为，要征服人首先要征服心，要征服心可向他们的祖先套近乎。至圣先师孔子自然在首选之列。精心策划的“尊孔盛典”因此而出笼了。认敌作父者到处活动，网罗人心。但

他们立即遭到反击。鹰隼作《上海要祭孔了》来斥责那些助敌筹办者：“即使我们的至圣先师一时糊涂，当他看到代表磕头的并非姓‘孔’，是也会扔掉那些‘冷猪肉’的。”还引《海角遗编》中清初有的学子被诱进考场翻然悔悟为例——特别引用了一位罢考者在试卷上题的诗——“满洲服式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胡人满眼泪，满腔心事满腔愁”来激励人们的民族情感。

比起“孤岛”来，沦陷区形势当然更加严酷。老舍的巨著《四世同堂》就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是日本人在当家，为了全家人能够活下去，瑞宣不得不到学校去教书。但他感到压抑和窒息，感到民族良心受到无尽的伤害，他宁肯到英国人富善那里去找事做。虽说英国人的过分自信与傲慢也使瑞宣反感，但比起日本强盗来也有根本上的不同，加上也没有更好的去处，只有在这个屋檐下低头。瑞宣的行为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还被捉到大牢里关了几天。瑞宣的爱国情结与前面提到的《不合作主义》中的女工有某些相似之处。不与日伪合作还有更隐微的表现。沦陷后的上海就是这样，“许多作品在表面上都带有不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斗争的‘纯艺术’倾向和适应消遣娱乐需要的‘软性’情调”；“更加重视艺术技巧，改造古代故事和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现象更为常见”；“以冷静平和情绪描写日常生活情趣”、怀旧揭秘，“以及描写江湖侠客传奇故事和以引人发笑为要旨的喜剧、趣剧，则明显增多……”（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日占台湾，不甘当遗民的文学具有“沉郁的色彩”。苏光文先生说：“这些作品，或写家庭中的婆媳矛盾，或写家庭中的母子冲突，或写家庭中孩子们的游戏。表现手法隐讳曲折，然而沉郁的反日之志、民族之情的时代色彩十分浓烈。”（见《中国抗战文学概览》）吴浊流的作品颇具代表性。《先生妈》写先生妈抵制皇民化，宁孤独而不屈其节；《亚细亚的孤儿》也充斥着抵制皇民化的描写，而且不限于一般抵制，还有强烈的反抗行

动：胡太明在墙上题写了“同心来复旧山河”的“反诗”。他被认为是疯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脑袋才没有搬家。结果如何？一说“谁也不知道太明的下落”，一说有人听见昆明电台他的对日广播。

（三）

作家塑造的艺术典型，最感人的，是对于生死关头的描写。真金不怕火来炼！“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是对“真金”的要求，也是衡量的标准。历代前人对“真金”赞颂不已，对后人阳刚正气的养育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的影响。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人杰”、“鬼雄”的内涵与以前已迥然有别——打上了抗战的烙印。

作家们着力描写了坦然面对死亡。南宋文天祥以自己为民族献身的行为和永不屈服的绝唱为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笔。他那铿锵有力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心灵。吴祖光四幕九场历史剧

《正气歌》重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临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光辉形象，树立了抗日救亡效法的榜样。历代传唱的民族“正气歌”促使了置生死于度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典型的诞生。叙事作品表现尤为突出。谢冰莹《东北义勇军英雄苗可秀》就是这样的典型。这位负伤被俘的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有类似文天祥那样的经历：高官引诱无所动，壮志未酬誓不休。刑场上，侵略者还怀着最后的希望：“如果你能投降，我们立刻就释放你！”他嗤之以鼻，选择了就义，留下了“正气千秋”。康濯

《风暴代县城》写青救会主任金方昌被汉奸告密，抵抗负伤被捉，同时被捕的还有 10 几名抗日干部。投降就可以活命，他们没有选择，他们选择了死亡，而且“死也要死得勇敢”。他们虽然英勇地走了，但他们的抗日口号却永远在辽阔的土地上回响。艾芜《春天的原野》也有类似的情形。游击队员满天星被日本人抓住，并押到野地。满天星看着同事一个接着一个被吊

死在树上，他不仅没有胆怯还唱起了悲壮的歌，充满了对日本人刻骨铭心的恨。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孙七在日本人的活埋坑边显得雍容自在，无畏惧之感。他蔑视刽子手，他自己跳进了土坑。抒情文学也有大量的反映。戴望舒被日本人关在狱中。他眷恋人生，又面临死亡。他用婉转笔调写下了这样的情怀：“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唱的是一首凄婉的不屈之歌。当然还有更主动的呐喊：“我们/必须/拔出敌人的刀刃，/从自己的/血管。/我们/人性的/呼吸，/不能停止；/血肉的/行列，/不能拆散；/复仇的/枪，/不能扭断；/因为/我们/不能屈辱地活着，也不能屈辱地死去呀……”（田间《给战斗者》）

如果说已经到了死亡关头进行选择是一种类型的话，不一定自己会碰上死亡关而自己主动挑战死亡又是另一种类型。这种主动性往往带有很强的悲壮色彩。荆轲明知刺秦有去无还，他还是要去。辞别白衣冠送者时吟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使人心灵震颤。敢于为自己的信念和承诺去死者还不乏其人。眉间尺就是其一。鲁迅有关于眉间尺的故事新编，赞颂的是眉间尺为父报仇和协助报仇的黑色勇士敢于“以头换头”的精神。胡风的诗《给怯懦者们》写了关于眉间尺的古老的传说，说他为报生父的血海冤仇，“把他的宝剑/还有/他的头颅/交给了/黑色的勇士”。“黑色的勇士”把仇敌诱杀了，眉间尺“年少的头颅/追着跳着/扑上去/向它搏击”。毕竟年少，不能制胜，黑色勇士也自砍头颅去帮忙，终于“击得它/咬得它/只剩有/稀烂模糊！”作者由此生发开去，希望那些怯懦者，那些“造谣言/买外汇/当奸细/在火边抢猎/替仇人做狗”的人，从这个故事中汲取力量，因为同样是“来自一个历史摇篮的/活在一个地母胸膛的/我的兄弟/祖国的儿女”。显然，胡风将眉间尺与抗战联系了起来。谴责了

缺乏眉间尺和“黑色的勇士”牺牲精神的各式各样的怯懦者，并且将复仇的对象从王扩大到整个民族的敌人。敢于“以头换头”在抗战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端木蕻良的《风陵渡》写的就是老艄公马老汉与侵略者同归于尽的故事。一天晚上，两个喝醉了酒的日本兵要他划船去河心观看“和支那的女人一样好”的中国月亮。凭数十年之经验，老艄公知道：那里水流湍急，无生还之希望。他将船摇进急流中，在哈哈“复仇的大笑”声中，将两个日本兵葬进了黄河，而他自己也被母亲河吞噬。唐征庸《太行烈士》写的是军人的这种壮举。坚守太行山的军队为消灭更多的日寇要作战略撤退。为保证这个任务的完成必须留少数人守住阵地以迷惑敌人。明知留下就会牺牲的壮士们并不畏惧，还把选中当成荣耀。最后留下的是7个人。他们歼灭了200多敌人，还抗拒了日寇四五个小时的猛攻。他们为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但毕竟寡不敌众，日军占领了阵地。阵地上是什么？六具中国军人的尸体，还有一名微息尚存者。这位微息尚存者见日军靠拢立即拉响了手榴弹，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唐弢《“和敌人一起倒下”》对这种敢于同归于尽的思想和行为予以了肯定，但他文中没有“黑色的勇士”，联想到的是远古劳动者对社会不公所产生的愤懑与无畏在心中凝成的歌：“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作者解释道：“这是表示‘与之同尽’的决心的。可巧这‘太阳’又正是我们的敌人的表帜。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四万万颗心等于一颗心，四万万句话等于一句话，那就是：‘起来！和敌人一起倒下！’”

在生死面前，还有一种感人的境界：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死的结果留给自己。骆宾基《东战场别动队》生动地展现了这种精神。别动队占据了要道，卡住了日本侵略军进与退的脖子。鬼子猛烈反扑，别动队寡不敌众。为保存实力，必须撤退。谁先撤？先撤者生的希望显然远比掩护者大。队长黄阿大可以找到任何先离开理由，但他没有找。他留下来了，为士兵们树立了榜样：“我给你们掩护……快向外跑。”他命令队

员一个一个撤走，不愿走的还被他严厉谴责。留下来狙击的后果可想而知。小说最后是烈火与焦土的描写，“悲烈而雄壮”。夏衍《勇敢的广东兵》也有类似的描绘。赖班长和一等兵叶仲明去抢回营长忠骸，遭到敌人的围攻。赖让叶撤，并掩护。面对围攻的敌人，他毫不畏惧，直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古人崇尚的“士为知己者死”之说不能与这种自己不过“江东”而要别人过“江东”的精神同日而语，因为前者为的是个别的人，后者为的是整个民族的新生。

二、“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中说过，从古以来我国就有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也就是“从古以来”就有敢于与黑暗和专制抗争的人。纵观历史，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还遵照历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而有所增强。其结果自然就是“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这是鲁迅 1934 年所做的陈述，抗战时期怎么样？也完全可以说“也何尝少呢”，只不过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集中表现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专制与黑暗。

(一)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加强他们的法西斯统治，民主和自由被带上了枷锁，一些人也因此而感到迷茫。茅盾在《腐蚀》前记中概括为“尘海茫茫，狐鬼满路”八个字，既形象，而又准确。

反对黑暗和专制、争取民主与自由，是抗战时期，尤其是皖南事变后的一项重任。要知道，不这样就不能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就不利于夺取胜利。同时也要明白，黑暗和专制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民主和自由也不可能自己从天而降。斗争

才是惟一可能取得胜利之路。王道和霸道是古已有之的统治形式。如果联系起来看，可以认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黑暗与专制是历史上霸道的最新表现。历史上，王道往往被人说是，霸道往往被人说非。历代有识之士为了扬王道抑霸道，仗义执言，无所畏惧。元代的关汉卿就是这样的硬汉。在《惊天动地窦娥冤》中，他不畏专制的威严与强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弱女子窦娥之冤，指斥地“不分好歹”，控诉天“错勘贤愚”。明代东林党，更是一个正气凛然的集体。当时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顾宪成等结党东林书院，议论朝政，主张开放言路，实行社会改良，置在朝权贵嫉恨于不顾。宦官魏忠贤专政，嫉恨更是变本加厉：不仅大肆搜捕，而且还杀害东林党人。野蛮的罪恶行径未能改变东林提倡实施带有民主色彩清明政治的主张，更没有使其屈服。迫害延续到思宗登基才终止，阉党也在这时被定为了逆案。带民主色彩追求王道的精神鼓舞着抗战时期的人们继续前进。

抗战时期的国统区自然不同于抗战之前，但仍存在“不分好歹”与“错勘贤愚”，而且日渐其盛。1938年6月，茅盾在《论加强批评工作》中尖锐地指出：抗战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一方面是血淋淋的英勇斗争，一方面是荒淫无耻、自私卑劣。希望大家看到“新时代的苗芽是到处在滋生着”的同时，也应该看见“新的人民欺骗者，新的‘抗战官’，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

揭露社会黑暗、暴露各级地方政府腐败的作品日渐多起来。曹禺的四幕话剧《蜕变》以省伤兵医院为立脚点揭露国民党官僚机构的种种腐败现象，老舍的四幕话剧《残雾》将色、财、权集一身的洗局长推上舞台揭露国民党官僚的无耻嘴脸，宋之的的五幕话剧《雾重庆》通过一群大学生的不同遭遇揭露国统区的污秽和对青年的摧残，沙汀的小说《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揭露防空主任惟利是图，徐盈的小说《征兵委员》揭露区长为征兵设置障碍……如果说皖南事变前作家在描

写社会现实方面还有某种自由的话，皖南事变后这种有限的自由也就越来越少了。人总是这样，越压越不服，何况还持有真理，并且还有冲击霸道的传统呢！当然，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不能轻掷。基于此，讽刺文学日渐多起来。有些讽刺古怪得有些发癫。如宋扬《古怪歌》：“半夜三更里，/老虎闯进了门，/我问它来干什么，/它说保护小绵羊。/清早走进城，/看见了狗咬人，/只许它们汪汪叫，/不许人用嘴来讲。/田里种石头，/灶里生青草，/人向老鼠讨米吃，/秀才做了强盗。”余意要读者用想像去补充，也就是要让读者认识到现实完全是颠倒了现实。也有轻松的讽刺。杜运燮《追赶物价的人》：“物价已是抗战的红人，/从前同我一样用脚走，/现在不但有汽车，还有飞机，/还结识了不少要人，阔人，/他们都捧他，提拔他，搂他，/他的身体便如灰一般轻，/飞，但我得赶上他，不能落伍，/‘抗战’是伟大的时代，不能落伍，/……即使是轻如鸿毛的死，/也不要计较，就是不要落伍。”当然，陆续也有一些“不怕事”的作品问世。有些小说有力地揭露了皖南事变后顽固派的黑暗统治。短篇就不说了，还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中长篇。沙汀的《淘金记》王西彦的《神的失落》、穗青的《脱缰的马》着重反映了顽固派统治下的黑暗现象，抨击了不合理的现实，反映了强烈的民主要求。李广田的《引力》、靳以的《前夕》、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描写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更为复杂的情形，既能体察到现实的黑暗又听得见争民主的呼声。沙汀的《困兽记》写一群知识分子在一个小镇感受到的不平，经历的磨难，明确指出到延安才是光明之路。

还有一些不愿屈服的民族感情强烈的作家，努力寻找能表现自己思想而又容易躲过“灾祸”的新的艺术形式。目光瞄准的是传统文化中之鬼神文化，认为是可利用的工具。鬼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有影响的组成部分。历来有信之与否之两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汉代就出过王充那样的无神论者，但

就总体来看，信奉者仍绵绵不绝，遍及偏远角落。他们将鬼神看成超自然的力量，除了顶礼膜拜和乞求恩赐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在这些超自然力面前，不仅无能为力，还显得非常渺小。消极的影响代代传承，而且比比皆是。张恨水却反其道而行，也不怕怪罪，敢于取鬼神按需要而用之。他的长篇《八十一梦》就是体现。作者的梦是现实与虚幻联系的桥梁。该书《楔子》曰：“不论是黄昏，是夜半，是天明，甚至是中午，只要我睡到床上，梦神立刻就引导我到另一个世界去。那个世界里的七情变幻，比我们这世界紧张得多，有时刺激得过于厉害，把我睡直了的身体，惊动得坐了起来。”怎么会不紧张、刺激、吃惊呢？人神鬼怪，天上地下，无所不有，光怪陆离。中国人熟悉的形象，如孙悟空、猪八戒、观音大士、善财童子、牛魔王、钟馗、土地、金面妖、弥勒佛等等，都在书中显了形。只不过他们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我了，而变成了发国难财的暴发户、高高在上的官僚、议而不决的空谈家、无民族观念的愚人、阉于墙的利己主义者、崇洋媚外的软骨头、口是心非的假面人、苦闷的小市民、丧失气节的民族渣滓。看来荒唐，实则不奇。《楔子》一针见血：“诸公有对于当时的社会，感到不满的，看一看我写的梦中生活罢。”对国民党统治区从经济到政治、家庭到社会、道德到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揭露与抨击。无疑，这是一部托梦幻言现实黑暗的浪漫小说，只不过为了安全起见采取了离奇的形式显现。徐訏抗战期间改作并重印过的小说《鬼恋》也涉及传统鬼神文化，与《八十一梦》不同的是，它并没有从积极方面去运用，而是作为艺术引力的手段，给作品抹上神秘的灵光。作者声称奉献给读者的——按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信、望、爱；还声称，无宗教信仰而有宗教感情的他永远向着的是真、善、美。实际上，给人的感觉是远离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而且是有意识的，其消极性可想而知。

(二)

国民党顽固派的矛头主要对准的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同情者与支持者。由来已久，水火不相容。抗战爆发，民族矛盾大于一切。在共产党的努力倡导之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国民党顽固派迫于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不得不接受团结抗日的主张，但骨子里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要消灭共产党。这与明末东林就有了某种可比性。郭源新的历史小说《风涛》，将这种可比性艺术化。明末朝中党风兴盛，什么阉党、宣党、昆党，闹得“头晕耳胀”。魏忠贤及其阉党党徒勾结内宫，“利用着天启帝的懦弱无知”，朝内外广收爪牙，以至于形成了一时难以逆转的执掌了大权的恶势力。他们独断专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最疾恨者当数东林，“切齿”要杀《东林点将录》中列名者“一百八人”。李应升从来什么党也不是，只知道为国家、为正义、为朋友尽他“应尽之力”。实在看不惯阉党专权，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决心，积极参与了倒阉活动。结果不仅是“被罢归”，而且还“踏着前面的六君子的血迹前进”了。在走完人生旅途前不久他有一首寄友人的诗，表达了他的希望：“他日蒙恩弛党禁。”反阉党专权仍矢志不渝。虽说已隔了几百年，国共已经第二次合作了，作者仍然提醒不能忘历史的教训，要汲取历史的经验。言外之意在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执掌大权，他们手中也有一本令“忠贤切齿，急欲下手”的点将录。曹白的《杨可中》写的不是魏忠贤时期的“党禁”而是抗战时期的“党禁”。毕竟是“进步”了，“禁”得不比从前，“别有一番天地”了。杨可中，“他的家庭并不穷，哥哥是公安局长，父亲还在做另外的更高的官。但不知怎的，他叫乡下人起来抗捐款，省里从此要捉他。他流亡出去了。到了北平，一面读书，一面斗争。后来到了上海，便在一个电影公司里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他参加了别动队。但他恨这个别动队：“提起别动队

——妈的，可杀！”原因何在？“队长叫我们是共产党，不如把我们去挡头阵，做日本的炮灰。第一夜走八十里，第二夜走一百里，把我们赶到火线上，呀呀呀呀，那许多飞机，那炸弹，有的人连枪都不会拿——就这样平白的炸死了——”显然，企图借日本人的手消灭共产党。这是“党禁”的特殊表现。真正“禁”得举世皆惊还不是《杨可中》描写、《风涛》提醒的时期，而是皖南事变及其以后。茅盾的《腐蚀》就揭露了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国民党特务赵惠明在皖南事变爆发前夕就说过：“有一种骇人听闻的阴谋，正在策动。”“消灭‘异党’的武力，这次已经下了决心，而且军事部署，十分周密，胜利一定有把握。”还说“我们的奉命‘加紧工作’，就是为了要使后方和前方配合起来”。血腥的皖南屠杀新四军的事件不久就爆发了。目的仅此吗？不，还在于消灭共产党。

当然不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必须揭露顽固派的阴谋。《世说新语》有这样的记载：文帝曹丕令其弟东阿王曹植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来，不然就要行大法。曹植应时而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流传非常广，而且还有一些变体。之所以会这样，比喻的奇巧与新颖自然是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它提出了非常普遍的兄弟阋于墙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又有很现实的意义。后来，尤其是外族入侵的现代，兄与弟的概念有了很大的扩展，以至于扩展到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两种政治力量、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党派。抗战时期就是如此。皖南事变爆发，全国震怒，举世皆惊。周恩来题诗曰：“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的确，大敌当前，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就是你国民党要“相煎”，也可以等一等，何必“太急”呢？

兄弟“相煎”，祸害无穷。姚雪垠《红灯笼的故事》就是